◆纵　横

公共治理变革是“互联网+政务”重点

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点。一是大力发展服务型电子政务，围绕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住房等领域，构建跨部门的大型综合应用系统。构建一体化网上服务或一门式服务中心，为公众提供无缝对接的全流程服务，打造智慧民生。二是围绕公共安全、市场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创新、诚信监管等领域开展工作。电子政务建设的重心要下移，重点发展县、乡镇、社区等基层服务型电子政务。同时加强电子政务的环境建设，特别是法制、安全和标准体系、国产化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电子政务评估制度等。（2015年12月21日《国家治理》 汪玉凯）

◆观　点

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谈到，大国一般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等方面去衡量。我认为物质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要素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一个大国的衡量标准，因此，我认为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

首先，从中国历史本身可以看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中国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

其次，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慢慢衰落。如果不能更新、不能改革，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走下坡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西方国家就是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再逐步走向富强民主。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背后又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策略的突破创新必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轨迹。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时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有助于中国全球大国战略的稳步迈进。

再次，中国有责任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现在有很多人说国外不了解中国，其实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现在有点悲观的看法是，中国一些人和媒体对于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原创的东西不多，他们对其他国家原创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让他人接受。

中国一定要将自己的社会研究透彻，包括执政党、社会、体制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制度背后本身就有一套知识体系；创造一种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其他人知道并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像西方国家，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文化帝国主义，即使花了很多精力，但也不能让旁人彻底了解西方国家。同样的，要想让西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就要解释好、解读好中国，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2015年12月上 《人民论坛》 郑永年）

◆评　论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为企业减负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和政策的具体路径，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意味着，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新常态视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后，时隔一年，中国提出了如何在新的经济周期打赢生死之战的政策选择。

外界在此前已经关注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历年最晚的一次，同时，四天的会期也是开得时间最长的一次。之所以这么晚召开，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要定调2016年的重点工作和政策选择，还要对下一个五年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的筹划；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周期以后，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如何在稳增长、防风险和调结构等政策目标上取得协调，可谓慎之又慎；三是，2015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风险征兆，7月的股灾，8月人民币贬值引发的恐慌，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的飙升和不断爆发的金融诈骗案件，都意味着防范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会议比往年来得晚了一些。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改革”列入重要的政策篮子，提出“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谓抓住了中国语境下“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政策要义。

面对现实，历史经验昭示，除非在制度层面拿出一整套的设计，否则总会陷入剪不断的恶性循环。让人高兴的是，除了去库存、降杠杆等问题，中央特别将减轻企业负担列入重中之重。从会议公报的描述看，为企业减负可谓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最大的亮点。

笔者调研企业，普遍反映税费等成本负担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套非常有针对性的组合拳。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到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电价以及物流成本，可谓抓住了企业负担的关键。减税减负是供给学派的真正内涵和精髓，向供给学派学习，最该学习的就是减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就是因为餐巾纸上的拉弗曲线而让供给学派赢得了很多企业粉丝。如果再不给企业减负，明年出现企业倒闭潮，后果不堪设想。

从经济周期看，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历史性巨变的转折点，传统的行业面临残酷的洗牌，但在告别高增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只是完成了中国经济的温饱问题，只不过刚刚结束了“低垂的果实”的阶段。下一个周期如果真的通过供给侧改革，打破垄断，解放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减税等措施为企业的转型提供宽松的环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2015年12月23日《新京报》马光远）

◆杂　谈

政策缺口处用关爱补足

做了近40年代课教师，教过学生上千，如今的月收入150元，依然说“我离不开孩子们”——山西陵川县积善村乡村教师宋玉兰的故事，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容易让人动容，继而惹人动怒。正因为如此，这桩新闻一经媒体披露便不胫而走，影响远播，引得当地政府迅速作出说明，一下子就有了明确说法，而且还是早有政策文件、只是尚未走完程序的圆满结局。

如果拿宋玉兰老师这样的个案，来感慨中国乡村教育多么贫穷落后、乡村教师是一个多么清寒可怜的群体，有些失之偏狭。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改变农村教育薄弱状况、稳定提高基层师资待遇方面，持续发力，从硬件到软件，都已有了进步和改善。有事业单位编制、与公务员同等薪酬水平又有寒暑假的乡村教师职业，在有些地方已经被看作“香饽饽”，尤其是有了国家“乡村教师计划”之后。长远地看，注定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回流乡村，让农村娃在和城里娃的教育竞争中，不再“输在起跑线上”。

不论我们对于个人的命运、待遇如何感慨唏嘘，民办代课教师的退出、消失，都是乡村教育提升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从晋城市和陵川县政府的回应便可清楚感知，从教育管理角度看，像宋老师这样的少数民办教师未被硬行辞退，已经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考虑个人实际困难的妥协结果，不能做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老师，只能带教幼儿班——多数农村小学里，带学前幼儿班也是正式教师的额外工作，不多的保育费既解决了家长的问题，也能为老师们增加点收入。

对于宋老师们，一个更精确形象却也更冷漠的说法，是“历史遗留问题”。发展太快、改变太剧，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实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已出现。应对社会的新变化、新要求，要不断深化改革，也就意味着新政策、新办法的不断推出，总会有一部分个体或群体置身于未能完美对接的新旧政策之间的缺口处、灰色地带。怎样对待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考验的是政府的管理智慧，也是政策执行者的理念和立场。

不割裂历史看待问题，尊重现实直面问题，以人为本解决问题——不论是媒体还是地方政府，如果能秉持这样的理念和立场，在解读民办教师境遇时，行事都会更为理性公允和温暖人心。以中国之大，不同地方的农村教育问题，包括民办教师等“历史遗留问题”，实际状况与解决的出路，很可能会千差万别。在政策不能覆盖到的缺口处，最需要的是对人的关注、关爱。（2016年1月5日京华网 姜泓冰）

新型城市化建设须纳入法治轨道

时隔3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日前再度召开。上一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1978年，当时，中国城镇化率约为18%，而到2014年已提高到54.77%。数据变化的轨迹，从一个侧面描绘出农耕古国向着城镇化、现代化不断迈进的精彩画卷。

当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城市病”。“城市病”既有硬件问题，比如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重地上，轻地下”的建设，缺乏一张“蓝图”走到底的规划，也有软件上的不足，主要是城市管理“重行政，轻服务”，千城一面，城市历史文脉被人为割裂，只有“人口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外来人口权益得不到保障等。这些问题背后的很大原因是既有法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城市发展规律，无法与发展趋势相适应。因此，把新型城市化建设纳入法治轨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我们要树立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法治观。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法治观也必须建立在这一基本认知之上，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理性主义，指导建设与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新型城市化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城市法治不仅体现在决策、规划、管理等环节的程序性制度上，还体现在对问题背后的城市发展机制的整体调控上。比如，在推进“精明增长”“紧凑城市”防止城市蔓延方面，仅仅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增量控制、加强程序控制等手段并不能解决一些城市“卖地规划”背后的经济发展机制问题，必须围绕这一机制的良性化来开展整体制度设计。

其次，城市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各方面法律制度的全面协同。例如，城市决策、规划、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必须要建立在贯穿所有适用领域的、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制度基础上，并结合城市行政特点形成特殊的公众参与制度。还要加强空间调控制度体系的法治化，确立主体功能区的法律地位，打破行政部门利益分化，促进多规合一。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强化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城市“五线”划定制度，加大法律实施力度和违法责任追究力度。

最后，以法治正义实现城市新老市民人权平等也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打破传统城乡人口身份的利益格局，保障新进入城市农业人口的经济权利、政治与文化权利、社会权利，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养老保障，这是体现新时期城市法治精神的新任务。

值得高兴的是，此次会议中提到了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针，依法规划、建设、治理城市，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好的理念是成功的一半，但也仅仅是一半，还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我们期待城市管理者把新型城市化纳入法治轨道，如此方能保障城市发展遵循城市发展自然规律，保障新型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2016年1月14日《光明日报》 王明远）

◆史海钩沉

盛世何以盛又何以衰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封建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对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

新朝统治者推行了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

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适时转变前朝的治国思想，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是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二是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同时，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是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入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持久盛世的到来。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创造新策，推行新政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转变治国思想，进而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创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

一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唐太宗带头减少“劳弊之事”。贞观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宫殿，材料已齐备，但想到秦亡的教训，便停止了。翌年，群臣以“宫中卑湿”为由，多次请求建造新的宫殿，他始终未同意。

二是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为突出。贞观二年，唐太宗问什么样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他深明隋炀帝偏听偏信的结果是身死国亡，自己便虚心纳谏，要求臣下踊跃谏诤。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前后有30多人进谏。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太宗从谏如流的开明作风，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改变了君臣甚至臣民上下阻隔、闭目塞听的状况，使君臣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下情。

三是任用贤才。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深知，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首先，建立选官制度。察举制始于汉文帝，成于汉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为标准举荐人才。其次，重视搜罗人才。李世民称帝之前，就开始揽聚人才，委以重任。而他们也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再次，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分别发挥各自长处。对此，后人评论道：“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是崇尚节俭。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等无所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他平时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服饰，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宫中的纬帐不施纹绣。

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六是团结异族。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因此，贞观时期，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少部落主动要求归附。

古代“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唐朝盛世，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旷世繁华。康乾盛世何等辉煌，但乾隆刚一退位，就爆发白莲教起义。各地骚乱，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统治者们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守泰”，社会各界由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太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滋生、积累、酝酿。而封建统治者后继乏人，直接加剧了这种状况。回望盛世，都有明君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有一批志存高远、才略卓越的名臣辅佐，共同促成盛世降临。然而，在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国家的发展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一代不如一代。数世之后，即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臣凋零，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谈何开拓进取。

二是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实现开元之治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转“昏”，怠于政事，委任奸佞；偏听偏信，不纳忠言；追求奢靡，激化矛盾。玄宗晚年宴乐无度，喜好女色。在他的带动下，“公私相效，渐成风俗，由是物务多废”，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官僚机构庞大、贪污腐化成风，必然造成百姓负担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三是统治阶级故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大清盛世的缔造者盲目乐观，沉湎于荣华富贵，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进步潮流的肇端。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封闭愚昧、妄自尊大，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停滞不前、不可自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2016年1月11日《北京日报》 岑大利）